

七星渠发展史 (中)

周嘉玲

七星渠的发展变迁,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支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陆续对渠道、建筑物进行规划治理。单阴洞沟、双阴洞沟、红柳沟、曹家路沟等渡槽的建成,标志着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中卫市中宁县开始应用。1978年渠口移至中卫申滩,渠道延伸29.5千米,水位抬高11.1米,完成新建、改建建筑物78座,新增灌溉面积近3万亩,这是在当时施工设备机械化程度较低情况下,灌区水利建设史上的又一创举。因渠道流量加大,部分边坡不稳定,影响渠道安全,所以采用现浇砼砌护渠道12.7千米。后陆续对部分渠道险段进行砌护,至1985年完成砌护37.49千米(以单侧长计算)。经过多年运行,这些砌护现基本老化塌落。

1990年以来,随着节水工作的逐步深入,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各段的引水量采取严格的宏观调控手段,实行限量供水。干渠因土渠居多,输水损失大,建筑物老化漏水严重,造成了灌区地下水位渐高,土壤出现盐渍化,已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

1998年以来,国家加大水利建设的投入,通过灌区重点工程建设和续建配套改造与节水改造等,采用全断面、防渗、防冻胀等措施进行

砌护,对渠道进行改造,截止到2018年,先后砌护渠道90千米,占渠道总长的75%。

1996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实施以来,推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三项制度,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工程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建设水平,管理工作不断改革、规范、创新,工程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2018年,中渠共有各类建筑物621座,安全输水和调控能力进一步加强,灌溉保证率逐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灌区开始发展扬水灌溉。20世纪50年代,为安置三门峡水库库区移民,在中宁县新民庄、白马寺等地七星渠上首次装备柴油机、柴油机等动力站,开发扬水灌区。随着新技术的应用,60年代建成鸣沙校场滩、红旗塘、古城子等水轮泵站12处。1968年后,中宁—青铜峡电网逐步通电,大部分泵站改为水电站。至2008年,灌区共有水电站43座,灌溉面积2.6万亩。

七星渠处于卫宁平原和中部干旱带的重要节点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造就了灌区物产丰饶,也为中部干旱带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七星渠延伸后,泉眼山跌水以上干渠水位抬高11.1米,为发展扬黄灌溉创造了条件。1978年,羚羊寺泵站建成,开创山区扬黄灌溉的先声。1988年,在唐家湖建设大战场泵站。1990年,加高扩整七星渠上段20千米渠堤,为同心扬水扩灌工程增加供水。199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始实施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先后建成红寺堡、固海扩灌灌区,分别于2003年、2005年全线通水。2017年,七星渠向中部干旱带供水5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50.2%,解决了中部干旱带百万亩农田灌溉和50万人、26万头牲畜的安全饮水问题。

七星渠傍山而行,沿线有山洪沟道31条,均穿渠入河,山洪灾害频繁。历史上,清水河、单阴洞沟、双阴洞沟和红柳沟并称“渠之四害”。据记载,清水河洪峰流量曾高达2340立方米/秒,历代治水者望而生畏,施治无术。明崇祯元年(1628年)筑清水河东坝,开凿人工河道,使清水河从泉眼山西流入黄河,消除对中宁县、七星渠之患。单阴洞沟、双阴洞沟曾有石拱涵洞过洪,民国时期已冲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山洪沟皆无过渠设施,每发山洪,任其冲闯,酿成灾害。

1956年到1957年建成红柳沟、单阴洞沟、双阴洞沟等渡槽,基本消

除了3条山洪沟的洪患。1959年,中卫县政府组织力量在清水河上修建长山头水库,减轻了洪水灾害,改善了生态环境。七星渠渠首上延后,新建跨清水河渡槽,结束了清水河为患七星渠的历史。1985年前,七星渠上共有输水渡槽6座、排洪渡槽4座、输水涵洞2座、排洪涵洞6座,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山洪对干渠的危害。1985年以后,对受损老化的双阴洞沟渡槽、曹家路沟渡槽、吴桥渡槽等进行了改造。1996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实施后,整治阴洞梁沟和石碛沟,建设香山北麓防洪工程,开挖排洪沟,修建防洪堤,将沟道洪水集中排入黄河,基本解决了山洪对七星渠上段的威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洪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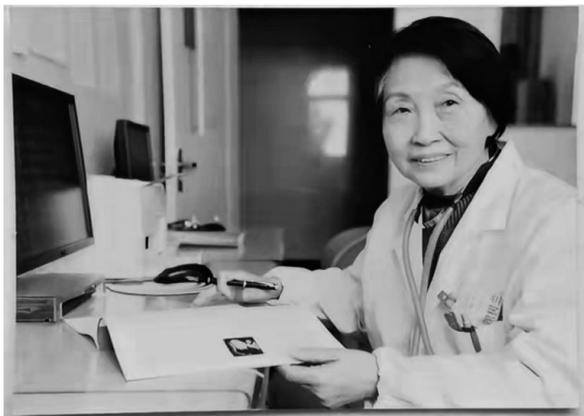
历史上,灌区仅靠南河沟、北河沟等自然沟道排水。20世纪60年代,灌区政府多次组织群众,挖沟排水。70年代,在排水干沟、支沟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田园化,使灌区“方地划区,整田为条”,灌排各成系统,为机械化耕作创造了条件,为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排水体系初具规模,各级沟道排水畅通,效果良好。

(作者系七星渠管理处防汛工程科副科长)

移民岁月 第一百一十七期

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 (十)

——记原宁夏医学院院长陈树兰



90岁高龄的陈树兰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

陈树兰:病人转到我们医院后,连续用药3天都没见效果。当时我们引进了心脏除颤仪器,我提出用这个设备。讨论时有的专家就提出反对意见,关键是怕病患血压过低引起意外风险,还有就是风险评估过高怕承担责任。面对病床上的患者,我下定决心,绝不放弃所有的努力,一定要试试。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们还找来了麻醉科主任和使用过心脏除颤仪器的专家,制定了严密的治疗方案,包括出现意外时的抢救方案。我做现场总指挥,除颤仪只打了一下,病人的血压马上就开始向好,心跳也恢复到了正常值。当时病人的家属感动地哭了,其实在实施抢救时我也知道风险很大,可如果我们不承担治疗的风险,病人家属就必须承担失去亲人的风险。还有一个姓陈的老干部,食道破裂住院,已报了病危,血压很低,手术条件很差,整整抢救了五天五夜,最后脱离了危险,康复出院。十多年后这位老干部得了老年痴呆症,很多事都忘了,但他始终记得我。

陈树兰说,在给病人看病上我竭尽全力,努力做一名合格医生所应该做的。把为病患减轻痛苦放在第一位让陈树兰在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职业的荣誉感,但有一件事让她十分后悔,那就是她的老公刘善理。因自己轻视了刘善理的一次意外摔伤引发后患。陈树兰:这是一件让我后悔一生的事,老头子在上班的路上因雨天路滑跌倒骨折,卧床一百天我都没有时间陪他,也放松了警惕性,后来引发并发症去世了,如果我当时把他的骨折当个事,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情。2014年,陈树兰被评为全国离退休老干部先进个人。2021年6月,陈树兰已年过九旬,尽管已经退休多年,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还聘请她为医疗专家,时常到医院内科室会诊。同年,她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陈树兰现在还在上班,医院遇到心血管方面的疑难病症还会请她,身边的同事说:有陈院长在身边,我们心里踏实。陈树兰说:移民到宁夏已经快70年了,在宁夏我没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宁夏人民对我的信任,也没辜负同事们对我的支持与厚爱,更没辜负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我尽我所能,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蒋银生 撰稿)

攻克豫旺城

1936年6月初,我七十五师攻占红柳沟后,继续西进。中旬,包围了宁夏南部重镇—豫旺县城(今同心县下马关)。马鸿逵的一支骑兵部队据守于此。

豫旺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四周有青砖砌成的围墙,高三丈多,宽丈余。城墙上堆垛林立,敌人居高临下,便于发挥火力。

我围攻之初,敌人先依托城外的民房和寺院抵抗了一阵。在猛烈攻击下,敌人纵火焚烧房舍,毁掉掩体,缩进了城里,用土砂沙袋封死城门,凭借城墙继续进行顽抗。当时红军没有重炮装备,要破城开敌,确实困难。

我师兵临城下以后,发现只有东门和北门外还有一些烧毁的民房残墙,敌人没来得及全部推倒,西门和南门外都成了开阔地。我军多次发起攻击,都因无法接近城墙,而未能动手。我们遂一方面派小队不分白天黑夜地轮番攻击,派宣传队发动政治攻势,向城内喊话、投传单,以疲惫和分化瓦解敌人;另一方面采取从城外挖地道的办法,由地下接近城墙,以便炸开城墙突进去。但还没等我们把地道挖到城下,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在城内挖了许多地洞,贴壁监听,发现哪里

有动静,就在哪里防守,这一来,我们的土办法也无法施展了。

然而,我们不间断地发动各种攻势,造成了敌人的巨大恐慌。围城七八天后,每天都有零散的敌官兵出城逃跑或投降。我们从俘虏口里和火力侦察中得知,城内守敌是一个骑兵营和一个民团,约一千人,武器多是骑兵用的马步枪,机枪只有二十来挺,且弹药不足粮食和水日益紧张;敌在守逃问题上分歧很大,骑兵营想逃,民团要守,争执不下,矛盾重重,军心涣散,多数官兵已无心战。敌指挥部以及防守重点在东门。

师领导将敌我双方情况作了比较:我们一个整师,共二千多人,相当于敌兵力的两倍半;每连有九挺轻机枪,火力绝对优于敌人;我军士气高昂,敌人士气沮丧。整个情况是我兵力、武器和士气都占优势。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强攻的时机已经成熟,若拖延时间,万一让敌人待机突围出城,我们步兵就难以追上敌骑兵了,那就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因此,必须抓紧强攻准备,坚决将敌围歼在城内。

师长和常玉清(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一起赶到军团部(驻豫旺堡)请示。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

听取了关于城内敌情和我们准备情况的汇报后,立即批准,同时指示我们一定要减少伤亡。

返回指挥所后,我们召开了各团长、政委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会上,首先传达了军团首长的指示,并请大家对最可能造成我方严重伤亡的登城和巷战这两“关”作重点考虑。同志们进行了认真讨论,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定下了先攻后进,加强策应,确保重点突破的方案。

会后,各团进行了战前准备工作。我们请来当地一些木工,赶制几十架带轮的木梯,并组织部队利用附近的树木、墙壁,进行推梯和登梯训练,还进行了机枪掩护下的小型攀登演习。27日白天,各团除照常派小分队攻击袭扰外,大部队在作好政治动员的同时休息待命。

27日晚上,风雨萧萧。9时整,西门和南门按预定方案首先发起了猛攻。与此同时,东、北门也响起了稀疏的佯攻枪声。敌人果然如我所愿地把东门和北门的火力调向了西门和南门。一个多小时后,五团报告说,一刻钟前发现西门和南门增加了三个机枪火力点,步枪火力也有加强。

我们马上命令三团、四团准备转入强攻。师长赶到北门,常玉清

和刘参谋长留在东门。11时许,东、北两门的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敌人的火力很快被压了下去。突击分队犹如猛虎扑食,推着轮梯,迅速冲进城下,开始登城。不到半小时,三、四团分别从东北两门攻进城内。在各自解决当面守敌的同时,三团一部由北向南插进,四团一部从东南方向推进,迅速包围并拿下了敌指挥所。这时,城内敌人陷入一片混乱,大街小巷人喊马嘶,溃兵四散。西、南两门的守敌惊慌失措,无心抵抗。常玉清站在东门城墙上打了两发红色信号弹,五团很快压了进来。重兵入城,敌人失去指挥,没作什么抵抗,就乖乖地缴械投降了。我军连夜清理打扫战场。这次攻城战斗,俘敌300多人,缴获战马约150匹,轻机枪、马步枪、驳壳枪、马刀等武器200余件,而我方伤亡不到2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攻克豫旺城这一仗,拔掉了马鸿逵设在陕北根据地西部边缘的一个重要“钉子”,解除了西征部队的后顾之忧,使陕北根据地西部扩大到豫旺县以西一线,有力地打击了“四马”经常袭扰我根据地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我军扩大骑兵部队创造了条件。(吴忠市政协供稿)

档案中的石嘴山 (六)



旧时商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洋行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致使部分牧民将毛运到石嘴山,无法销出,又不能运回。洋行趁机杀价,故意不开盘,有用无市。然后他们指使下面的人,利用实物交换,酌给米、面、布、茶、糖等物换毛,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

贷银订毛这种方式,无异于“趁火打劫”,和农村中的“买青”是同一性质的。“买青”一是在青黄不接之时,一是在牧民春困羊瘦之期。洋行利用牧民困难之际,以低估产量和压价预购的方式订立合同,把牧民永远捆绑在他们的合同上,年年为他们提供羊毛。

各大洋行设立的外庄,犹如对西北牧区撒下了天罗地网,几乎囊

括了全部西北产毛区。设外庄的有:内蒙古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各旗;宁夏的银川、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中宁等,贺兰、平罗、惠农各县,直接收购;甘肃的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青海的西宁;陕西的靖边。根据外庄小老板每年腊月回来的人数总不下五六十人的情况来看,洋行外庄设点还不止这些。

洋行每年收毛的具体数量,现已无可考据,仅根据行内下级人员及工人的回忆,估计一个概数如下:据王煥章先生谈,有一次他给新泰兴大老板理发,有人问他今年收了多少毛,老板说收了100来万公斤;再据洋行打包工人杨华林老人(81岁)说,每

个行每年船运数不少于100船,每船载重量是1万公斤,那么总数还是100万公斤;又据冒良臣老先生(在平和洋行当过学徒)说,他曾给洋行办过海关三联执照。平和洋行每年船运120至130只,驼运不少于千峰。每船1万公斤,每驼125公斤,总计1300万公斤左右。若以六大行的总运量来说则年达750万公斤以上;根据《西北从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购甘、宁、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运、驼运至天津出口……昔贸易盛时,年可收皮百万张,羊毛约三千万斤”。由上面的四种说法估计,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10大洋行每年收皮百万张,毛1000万公斤左右,是比较可靠的。

“海关三联单”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逃避中国税赋的那个东西。三联单是天津英商直接向海关主管部门要来发给各地分行,分行再发给外庄,在起运羊毛时使用的。上面印有各种皮、毛名称,如老羊皮、山羊板皮、羊绒、驼毛等,使用时,洋行先将起运皮毛开列清单,派学徒持书照清单数字一一填入三联单上,加盖“验讫”公章,一联存当地主管税卡,一联报省,一联由洋行随货持送海关。有了三联单则可通行无阻直运天津,税务人员不敢留难。如出口再按章纳税,不出口则不纳税。五百文制钱算是洋行发给文书的“润笔费”。

民国四年(1915年),新泰兴、仁记二行开始设立打包厂。打包厂的设立是洋行为了掠夺和剥削石嘴山廉价的劳动力。原是将原毛运到天津再加

工,自设立了打包厂后,各地都将羊毛运到石嘴山加工打包后再运往天津。

加工厂的程序分为几个步骤,先是绽毛绞,次抖毛中土沙,再次是洗毛、风干,最后打包起运。因为工序有好几种,工种也分为好几种,工资分为好几等。

工人的分工大致是:毛头儿是一些熟练工人,他们既能领会洋行意图,又熟悉当地和工人的情况,遂被洋行吸收为长年工人,专门为洋行组织和训练工人,指挥调运工人;大工是重劳动工人,干装卸打包等工作;小工是轻劳动工人,干绽毛绞、洗毛、风干等工作;童工是辅助劳力,专门抖毛。除了毛头儿,大部分是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除了工资,再无其他任何待遇。工资等级,毛头儿每月银5两,大工每日制钱180至200文,小工每日制钱80至100文,童工每日制钱40至50文。工资的发放各行不一,有的行当天发,有的行10天一发。

羊毛有羊毛与青毛之分。羊毛因为一年剪两次,纤维较短,故收购价格低,在早期每100公斤羊毛,6至10两银子,晚期增至14至20两,洋行运至天津为100斤羊毛售价50至60两银子,最高达70两。青毛因为一年剪一次,纤维较长,故收购价格较羊毛为高,平均每100公斤羊毛为30至40两银子,洋行运至天津100公斤羊毛售价为60至80两银子,最高达到100两以上。根据上面这个收售价格来看,洋行最少都有二分之一的利润。以40年来计算,10大洋行累计从西北掠夺去的羊毛约4亿斤,皮约4000万张。(据石嘴山档案)

感动中国的冯志远老师 (二)

在鸣沙中学期间,冯志远经常阅读《文汇报》,特别是那些经过马毓仁读之后又划出记号的文章,他更是仔细阅读。当时,这份《文汇报》把他俩夫妻间的情怀与业务学习交流结合了起来,使远离上海的支宁人经常能体验到上海风情。同时又把文史界、教育界的动态传到了大西北的穷乡僻壤,使他能够领略到沿海学术制高点的韵味,融入自己的三尺讲台,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身于西北农村教育事业。

在鸣沙中学期间,冯志远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早晨与学生出操,上午备课、上课、改作业。下午,除了上课之外要挤时间辅导。课外时间还要给学生面批作文、个别辅导。晚上再挤时间攻读相关的经典名著,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和营养,在学术上下功夫。

初中的古文教学是语文课的一个难点,教与学都比较困难,每一篇的教学时间一般要2至3课时。冯志远抓住课文短这个特点,每次上古文都先由自己背诵课文,然后引导学生复读,再逐段逐句串讲。他熟记着教案和课文,抓住中心,层层深入,句段词语的讲解有如枝连叶衬。听他在课堂上讲《卖炭翁》,在下课之前检查教学效果时,学习较好的学生有的已经会背课文。师生们都认为,冯志远的语文课讲得好。

冯志远初到鸣沙中学期间,兼带俄语。俄语不是他的专业,但他学得很好。东北师范大学有俄籍教师,学校医务室有俄籍医生,学俄语的环境条件好。冯志远大学毕业时,不仅有阅读俄文报刊的能力,还能与医生对话,带初中俄语课并不困难。但是,农村学生们对外语很不重视,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冯志远的俄语教学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还有

些学生记住当时学的一些单词和短语。

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教学方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冯志远十分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他从东北到华东,又从上海到宁夏,地区差别太大了,但是他总能迅速地适应。他尊重领导,团结同事,对学生关怀体贴,与学生们建立了亲切的情谊。他精心设计每一节课,每次上课都能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教学内容上,使学生关注教学重点,突破难点,从而学有所得,增长了知识。他注意阶段考核评奖,使学生们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学习信心,更加勤奋地学习。

冯志远在教学工作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无论是课文教学还是作文教学,他都注重个别辅导,通过个别辅导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在60年代初期,他每个学期对每个学生面批作文一至两次。每个星期安排的语文自习课辅导,他都要带着一批问题,到自习课与学生交谈。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上课了,冯志远在与学生交往中又引导大家同读课外书籍,进行阅读指导。1967年冬天,样板戏盛行,他与学生们一起学样板戏,他的宿舍成了临时课堂。有时候,他边拉胡琴边唱边演边教。他带语文的初二两班学样板戏的人多了,大家请他和班主任李述培导演,排练了《沙家浜》,1968年在春节期间到附近农村演出。学生们在排练和演出中提高了文化素养和艺术兴趣,回乡以后有不少人成为农村文艺活动的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宁县的文艺宣传队伍中涌现一批新秀,其中许多人是冯志远在鸣沙中学教过的学生。

(中宁县政协供稿)